

中国民盟雅安市委委员会：《荣经民盟简史》（中国民主同盟雅安市委委员会网站 2015.8.12）

## **第四章 参加建立新政权**

### **第一节 参加支前**

1950年2月9日，解放军进驻荣经。当天荣经新县委和地下党组织接了头，研究荣经情况。在地下党组织介绍下，地下党、团员和大部分地下盟员，于2月10日集中在县政府参加即将展开的支前工作。学习两天后，组成以南下人员为组长，地下党、团、盟员为成员，解放军553团武装保护的四个支前工作队。朱世正在雅安时即被任命为西康支前委员，解放军到荣经后，又被任命为支前委员会主任，为解放军筹集粮草。从城区开始，逐步到城郊，进而到东南西三个区，最后进入北区。工作队下乡宣传政策，征借支前粮食。在工作队的努力下，全县很快征借了近八万斤大米。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将荣经原东、南、西、北四区改建为三、四、一、二区，各区的征借粮工作队就是各区人民政府的领导班子。由南下人员或五五三团营级干部担任区长、区委书记，地下盟员一部分留下担任区人民政府的民政、财粮、文教等助理员或一般区干部。盟员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动员组织民工运送，棉衣、军粮等作战物资到汉源，支援西昌地区军事需要。

### **第二节 参加接管**

1950年2月11日，荣经县人民政府张贴出布告，宣布荣经县人民政府正式建立。新政权的建立，首先抓接管旧政权的工作。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分配下，部分盟员参加接管。刘光烈、郑树贤接管民政科；秦朝钟接管财粮科和参议会；党玉田参加接管警察局，张正樑接管教育科；孙华榕接管荣经中学；又调张正樑接管城东镇中心国民学校；毛尚文、赵锡琮等接管城西镇中心国民学校。

参加接管的盟员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被接管单位的人事、财务、财产、档案等，审查处理各种问题，接管工作迅速顺利完成，使新政权很快步入正轨。

接管工作完成后，刘光烈被任命为民政科科长，秦朝钟任命为财务委员兼秘书、财政科副科长，童梓平被任命为文教科科长、孙华榕任命为荣经中学副教导主任，张正樑、毛尚文分别被任命为第一、二完全小学校长，陈应硕被任命为第三完全小学校长。

### **第三节 参加肃特**

荣经县人民政府成立后，1950年3月开始清匪、肃特，公安局王夫局长亲自抓清匪、肃特工作。盟员党玉田被分配在公安局作预审股股长。不久又将吴家声、兰绍忠调到公安局加强此项工作。

根据余仲箴口供，潜藏下来的调统局特务荣经组组长是罗秀峰，因此将重点放在罗秀峰的身上，公安局组织准备擒贼先擒王。但就在这时，蒋介石侍从少校侍卫官、息烽训练班的李儒江潜回家乡荣经。中统特务任俊箴在重庆解放

前夕指挥破坏工厂后潜伏下来，此时潜回荣经（李儒江外侄婿）。名义是二十四军中校副团长，实际是中统特务的刘允光（李儒江外侄）潜回荣经。军统特务朱子江也暗藏下来，在荣经、天全、雅安、洪雅等县活动。从潜藏在荣经的特务看，人虽不多，但都是狡黠之辈，破坏性极强、危险性极大。几经设法终于抓捕了李儒江、任俊篪两大特务。从捕获时查出的材料证明，他们草拟了计划，正在作烧毁荣经粮仓的工作安排。

由于刘允光表面上还挂着二十四军中校副团长名义，抓李儒江、任俊篪时没有动他。李、任的落网，自然引起他的恐慌。于是公安局派专人打入其家及其近邻，直到完全掌握他准备外逃的确切情况才决定抓捕，但因抓捕时间被王夫局长推迟了12小时，使这个特务脱逃了三年。

又过了三个月，重要牢牢地抓住了罗秀峰的线索，找到其潜伏之所，摸确情况后及时采取了措施，于五月初在黄家坝山上将其捕获。

军统特务朱子江与雅属各县反动头子均有联系，行踪倏忽，几次在荣经、天全追踪都被滑掉。公安局采取放线等鱼与赶鱼进网相结合的办法，于七月初在兰家山将其捕获归案。不到半年时间，将暗藏在荣经的中统、调统、军统特务全部捕获，有力地保卫了新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人民生活。（说明：在这一工作中盟员的贡献是较大的）。所抓获的特务，后来经人民政府审判，在雅、荣两地予以镇压。

#### **第四节 参加政治运动**

##### **工商业改造**

荣经解放前夕，盟组织派赵鸣和到工商业中作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城东镇副镇长身份组织工商业中的骨干，做工商业者的工作。1950年10月，荣经县工商业联合会成立，赵鸣和被选为工商联主任，传达执行政府有关工商业的政策、法规，反映工商业者学习情况等。“三反、五反”时，在县委领导下，赵鸣和执行党的反偷税漏税、反行贿受贿等“五反”政策。在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中，他参加了“对私改造办公室”的工作。

1956年各行业公私合营时，赵鸣和在工商联所属各行业及分会中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完成了荣经县内的私营工商各行业的公私合营。

##### **参加减租退押**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展开了减租退押运动。盟员中有十一人因家庭成份是地主，减租退押运动必然涉及其家庭。早在地下时期，这些盟员就变卖家庭财产为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开展革命活动，创办学校，为外来人员安排生活，如：刘光烈、孙华榕、肖锦等。在彻底摧毁封建经济阶段，盟员们都能积极动员家庭献出全部家产，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国家减租退押政策。个别有家庭财产支配权的盟员，又在工作岗位上的，都率先交出财物。有的盟员的父辈，还被誉为开明士绅，在群众中起到良好影响。十一名盟员及其家庭都顺利地通过了减租退押运动。有的地主转移财物，逃避斗争，盟员向农会、人民政府提供线索、情报。

## 第五章 “镇反”蒙冤经民盟蒙冤

### 第一节 背景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在解放军南下渡江时，中共曾经发布“约法八章”以瓦解国民党军队，其中第五章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作俘虏，不加速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8页）

但在50年代初，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许多叛乱，新政权受到旧势力的挑战，于是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仅仅用了不过年左右的时间，各地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各种旧势力，包括恶霸、地主、惯匪、特务、国民党党团及军警政骨干分子，以及曾经杀害中共人员或给中共造成严重损害的分子，大部遭到了严厉的镇压。1950年3月，西南局向中央报告称：“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八十余人。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部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之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104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华北、华东、华南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于是，刘少奇和毛泽东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各类指示。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人，关了1,290,000余人，先后管制1,200,000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人。”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这个数字超出了毛泽东当初计划“千分之一”的水平。

据统计，在西康，共打击19,845人，其中杀6,628人；关10,029人；管3,188人……在运动高潮中，由于检查不够及时，控制不够严格，超过中央要求的控制数。在这种背景下，以朱世正为首的起义队伍受到了严重怀疑，遭

到残酷镇压。

## 第二节 朱世正被捕

根据“镇反”运动七年之后的《人民日报》公布的张志和罪状，明白了张志和及荣经民盟万劫不复的原由。195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在《四川的右派群丑》的报道中说：“材料证明，章（章伯钧）、罗（罗隆基）联盟为独霸被称为民盟‘发祥地’、‘根据地’和‘大阵’的四川，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作了布署和准备。刘、邓大军渡河以后，他们认为‘国共南北对峙’局面下，正好大有可为，为达到在‘三分天下’中‘割据西南’的目的，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逵、范朴斋、张志和、张松涛等，根据章伯钧的扩充实力搞军事投机的指示，除拉拢大批袍哥（即哥老会）地主恶霸特务入盟（如川西十五个县六百六十八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袍哥特务），同时还在川北、川南、西康等地收编袍哥、土匪，建立反动地方武装，阴谋与人民争天下，企图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拥有两三千多袍哥土匪，到处抢劫群众的土匪头子朱世正，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解放后，这些反动武装纷纷发动反革命暴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亲自发展的伪保安团长王德全首先叛乱之后，随着朱世正等匪部也都参加了叛乱。”

然而，历史证明：这个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的“纪希晨”，对这个事件的叙述完全是子虚乌有，“章罗联盟”根本没有所谓的联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路线从来没有军事诉求，从来就不打算走暴力政治这条路。从前面几章罗列的大量事实，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个军事部署是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志和下达的，而且自始至终是通过王少春的电台指挥、监控、实施的。

如前一章所述，解放后朱世正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叛乱迹象，而且作为支前主任，他积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功新生的红色政权（顺便说，他不是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彭迪先）。而雅安王德全也根本就没有叛乱，倒是在保卫雅安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查遍现存所有的历史档案，找不到一句可以证明朱世正、王德全实施叛乱的蛛丝马迹。尽管芦山、天全、名山、雅安等地土匪纷纷叛乱，但荣经已经解散的原朱世正的队伍是安分守己，清风雅静的。实际情况是，天全李元亨部队叛乱，围攻荣经城，当时朱世正住在荣经县城里，荣经县委担心朱世正与土匪里应外合，于是“先发制人”将其逮捕，武装押送至雅安关押。（1952年4月被正式逮捕，收押在重庆白公馆，1959年被判刑15年，同年被送往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1977年被释放回雅安，共度过25年铁窗生涯，1985年得以平反昭雪。王德全的情况也属于怀疑其里应外合，于是被“先发制人”。）

镇反时期各级政府中的“五人小组”有着非常大的权力，当时荣经县委五人小组对朱世正这支部队的性质所作的结论是：“以张志和为首来荣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土匪性质的武装组织’。并决定对中队长以上人员‘均应以土匪内奸论处’。并将这一结论上报雅安地委五人小组、四川省委五人小组。从此凡在荣经参与这一工作的党员、团员、盟员、民协会会员和其它非党进步人士及其

家属子女备受株连，两代人蒙受“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不白之冤。（见中共四川省委川委函（1983）51号文件）

### 第三节 错杀盟员和起义有功人员

1950年4月，镇反开始后，政府没有根据荣经民盟真实、具体、可靠的历史情况进行甄别审核，没有对西康、荣经民盟作审慎、正确的判断，不仅没有按有功人员对待，反而追究了参加起义的民众自卫总队陈志霄、高永富、陈春泽，联防自卫总队杨三江、王华勋、彭学贤、柴国嘉等盟员过去历史上的污点，没有按中央“约法八章”的承诺办事，而把他们全部杀掉。整顿后的民盟西康省支部筹备委员会迫于压力，也罗列了策反有功的宣传部长黄汝杰的罪名；罗列了参与办学、活捉余仲篪、策反和组织革命武装的功臣肖锦的罪名，并将他们开除盟籍。在镇反中，黄汝杰被杀。肖锦被判劳改，后来失踪。

荣经镇反，错杀109个民盟和地下党共同领导的起义有功人员，另有36人于服刑中死亡，共计145人冤死，数百人受株连，遭管制，荣经民盟顿时遭受灭顶之灾。这些人员及其配偶、子女、甚至孙子无不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45年后才得平反昭雪。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大军将五宪大院子生产队的李少均五花大绑到城里东方公园批斗，只因他在朱世正起义部队担任过分队副队长，属于土匪小头目，“五类分子”。又如高永富（盟员）被错杀后，妻子几次寻死未成，儿子高玉均读书就业被阻，女儿高玉芬考取体校、卫校，都由于政审过不了关，不予录取，1962年在印刷厂又遭无故压缩回家。小女高玉锦无力供养，被迫送人。

### 第四节 停止活动 进行整顿

解放军1950年2月1日进驻雅安后，中国民主同盟西康省支部筹备委员会立即得到中央转来的指示：“停止活动，进行整顿。”1950年4月8日至13日，中国民主同盟西康省支部筹备委员会召开各县干部扩大会议，荣经童梓平、刘光烈等七位盟员出席大会。会议批判了民盟西康省筹委领导人的所谓“政治路线错误”，作出撤销“中国民主同盟西康省支部，拥护四中全会宣言”的决定。同时成立了由赵锡骅为召集人，成员冯泽生、杨立之组成的盟务整理委员会。会议通过整顿方针、办法和学习计划。荣经同时成立了整理委员会，童梓平为召集人，成员有孙华榕、秦朝钟、石明玉、毛尚文、吴家声、书记尧俊成七人。

1951年4月19日，民盟西康省支部雅安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并成立了盟籍审查委员会。荣经民盟在民盟雅安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下，成立了登审小组，由赵鸣和、毛尚文、秦朝钟三人组成。整理委员会根据民盟雅安临时工作委员会的要求，作出荣经盟务整理的办法和步骤：

- 一、根据盟员工作系统和工作地点的距离远近，划分小组；
- 二、小组学习文件是：民盟中央一届六中全会的开幕词、闭幕词、政治报告、田一平同志的《论忠诚坦白》、《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文件；
- 三、在学习基础上进行讨论座谈；
- 四、最后填写登记表，经小组审查后报雅安临时工作委员审批小组批核。

学习、讨论、座谈、检查、小组鉴定，结合每一个人参加镇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的表现，进行全面审查。

荣经盟务整理委员会和登审小组在整顿过程中，向民盟雅安临时工作委员会盟籍审查委员会报送三十六名盟员花名册，经过民盟雅安临时工作委员会盟籍审查委员会批核，共恢复二十七名盟员的盟籍。其余九人中，有三人参军，三人复学或考入新的学校学习，三人未批。整顿工作于1952年初结束。

在紧接着的“三反运动”中，负责为朱世正的起义部队供需的秘书李毓昆（盟员）被诬蔑为“贪污粮食”送入监狱；当时担任荣经县人民政府财政科副科长的秦朝钟（盟员），被诬蔑为“账目不清”打成贪污分子收监；第三小学校长陈应硕（盟员）因参与组训武装队伍，被诬蔑为“贪污”遭轮翻批斗、罚跪，气愤之下含冤上吊而死；民政科科员郑树贤（团、盟交叉），被诬蔑为“克扣教养院人员伙食费”遭批斗管制留用改造。

### 第五节 参加教育建设

可以说，遭遇“镇反”和“三反”后的荣经民盟，都是在忍辱负重的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直到拨乱反正）。荣经盟员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曾从事教育工作，因而，荣经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即安排参加教育建设。童梓平首任文教科长，统筹教育事业；孙华榕、张正樑、毛尚文、陈应硕分别接管荣经县立初级中学、城东镇中心国民学校、城西镇中心国民学校、私立明诚小学。分别组建为荣经中心校、第一完全小学、第二完全小学、第三完全小学。部份盟员分别派到鹿鹤乡、新庙乡、三合乡、五宪乡担任恢复或新建农村小学的领导工作。

荣经盟员在盟组织教育下，对荣经中、小学建设，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师资培训，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以及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诸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为了适应翻身农民对文化的迫切要求，人民政府在各乡办起了中心校和分校，教师严重不足，县上开办了几期师资培训班，盟员除担任正规教育外，还分派担任师资培训班的教学工作，为培养急需的初小教员，不讲价钱，不计报酬，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来文教科为提高在职教师的文化、业务水平，成立星期日进修学校，分配盟员侯文元任主讲老师，除在县上集中面授外，分别到花滩、复顺、荣河等集中点进行面授辅导，帮助在职教师赶上工作需求，在职老师一致认为收获不小。

在推行普通话教学时，又由侯文元、孙光远协助指导。1953年西康省教育厅把荣经第一完小列为“五年一贯制”西康省试点学校，盟员张正樑任校长，受命挑此重担。省教育厅将各县在厅轮训的文教科长和省团地区少年工作部派员组成工作组，来该校总结教学经验，西康省教厅直接组织文章发表，推动全省“五年一贯制”教学工作。当时在一完小担任主讲，进行公开教学的有盟员杨学枢、侯文元、石章洵、孙光远等。

文教科在推进教师制订各科教学计划时，以盟员侯文元语文教学计划为示范，组织全县教师进行学习、讨论，通过试行，然后全面推广。

荣经中学是全县最高学府，其教学质量、教育方法对全县小学都有指导意

义。盟员孙华榕是荣经中学教导主任，孙光西是语文教研组长。由民盟支部和荣经中学党组织、行政领导密切合作，有计划地组织了三次公开示范教学，由孙华榕主讲，组织城内小学和农村中心校教师听课。三次讲了三篇课文，共同探讨教育教学艺术，受到全县教师好评。几十年过去了，听过孙华榕示范教学的教师，现在还能清楚地重新复述演示，可见印象之深、效果之好。

五十年代，文教科主办《教学与学习》，民盟组织积极支持，组织盟员结合自身教学、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撰写稿件，颇具质量，有的稿件曾为《西康日报》转载。

## **第六章 从“反右”到“文革”**

### **第一节 “反右”背景**

当年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是水落石出、不留尾巴、全盘否定、有了历史公论了，然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屈辱、多么惊恐啊！在1957年下半年的运动中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划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为55万多人，有人说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即以55万来说，这个占了当时估计总数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

特别是与民盟沾边的知识分子更是“罪孽深重”，人人自危，更不要说和“章罗联盟”、和张志和直接挂上了钩的荣经民盟知识分子了！

前面一章中，已经看见了《人民日报》那个“纪希晨”字字见血的罪状，陷民盟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毛泽东在6月10日写的一个指示中说：“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

接着，毛泽东又亲自在1958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其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民盟自己的领导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章罗联盟的透视”，其中一段说道：“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伯钧和罗隆基仍然在做着中间路线的迷梦，要把民主同盟引导到反动的第三条道路上去。他们从来没有估计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他们满以为内战要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国民党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消灭国民党。’他们以为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机会到来了。章伯钧就在华东、西南、西北布置军事活动，满以为有了枪杆子，就可以称王道霸，至少可以同人民政权和蒋介石三分天下。”（《人

民日报》1957.07.11)

胡愈之是民盟中央秘书长（中共党员），有史家认为他的目的是希望让章、罗二人来承担罪责，以拯救民盟，这或许是一相情愿的想法。事实是他一出头与“纪希晨”之流配合口径，共同为民盟布置出这样一个漆黑的背景，戴上这样一顶漆黑的帽子，民盟的罪恶就更是铁案如山、死有余辜了。

迟蓼洲编写的《1957年的春天》中说道：“现在查明，全国盟员中的右派人数约占盟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左右，而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却占了全体委员的百分之二十九，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占了百分之四十三，在中央常务委员中占了百分之三十六以上。在地方组织中，据初步调查，民盟全国24个省（市）地方组织中，为右派集团篡夺了全部领导实权的，有上海、四川、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广东、江苏、陕西等十个；大城市的县（市）的地方组织，有武汉、重庆、济南、青岛、福州、杭州等六个。”（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第74页）于是，上自章伯钧、罗隆基，中有潘大逵、张志和、彭迪先、范朴斋、张松涛，下联孙华榕、童梓平、郑树贤、吴家声……“黑线”所及，玉石俱焚。张松涛被打成极右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李伯平被划为反革命右派送劳教；罗西玲和杨汇川被打成反革命右派，跳水自杀。荣经公安局预审股股长党玉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在押送往劳教途中从桥上跳江自杀。

## 第二节 “反右”对荣经民盟的冲击

早在盟中央召开“三大”时，就已经给自己的组织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于是基层所有的知识分子顺理成章也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只能在“灭资兴无”的口号下进行“脱胎换骨”的关门改造。1957年反右时，荣经地下时期盟员经“镇反”整顿之后所剩本已寥寥无几，又把孙华榕、郑树贤、吴家声、孙光西、尧俊成、石明玉、张正樑、童梓平、石章洵九人划成右派分子。民盟雅安县委立即对这九个人作出相应的组织处分：开除前面七人盟籍；童梓平留盟查看，石章洵严重警告。同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四人，一人判劳改，两人判劳教，一人开除回家交群众管制八年。至于株连其它非党进步人士被处罚、判刑就更难计数。曾经庞大的、生机勃勃的荣经民盟组织，仅剩下十一人，支部三名委员均已被开除，其中还有未公开的“内控右派”。至此，荣经民盟组织完全土崩瓦解。兹举几个个案如下，可见反右运动之借题发挥、深文周纳、无限上纲、蛮不讲理。

童梓平，荣经县副县长，整风前两年把严道一小校长程秉清（改革开放后任荣经中学校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调到文教科任主办科员。干部胡某到县委告状说童用干部重才不重德，程的家庭成份是地主，父亲有历史问题。责令童立即把程退回。童当时年轻气盛，向县委反映说县委个别成员剥夺其职权，搞专权。于是将童的言论定性为“叫嚣不民主，有职无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定为“极右”分子。

孙华榕（荣经民盟主委，荣中教导主任），在雅安鸣放会上说：“学习苏联要从实际出发，不要样样都生搬死学。荣经县粮食统购统销任务重了点。”孙的言



论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在荣经的代理人，招兵买马与党争夺领导权(当时开始发展民盟成员一人尚未批)，反对学习苏联老大哥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先被划为极右分子，后说他“死不认罪”送劳动教养。在成渝、成昆铁路强迫体力劳动，身心备受摧残，妻子和儿女活活饿死。只留一个小女孙力田进了孤儿院幸存。家贫如水，无生计，祖孙俩拉架架车维生，因劳累过度吐血而亡。更为可恶的是，死后城厢镇不知，还下通知叫他去接受大会批判。

孙光西(荣经民盟支部宣传委员，荣中工会主席，教研组长)，在雅安鸣放会上说：政治学习每周十七个钟头过重，请领导考虑。农业合作化发展形势快了点，影响粮食生产，很多农民上街买馍馍吃。苏联花布质量还不如本国好，为什么进口这么多？这些言论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在荣经的代理人，反对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利用拉帮结派的小圈子篡夺工会领导权，污蔑农业合作化，破坏中苏关系。是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并株连儿女，儿子投考中学成绩名列第一，不准录取。

“反右”之后的中国民盟一片万马齐喑，而荣经民盟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个个三缄其口，生怕因言贾祸，赔了身家性命。

### 第三节 “文革”荣经民盟被迫停止活动

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一开始，别说荣经盟员不理解，就是刘少奇以下的中共党员也不理解。民盟基层组织在动荡的浪潮中无法得到上级指示（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组织都被砸烂），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无所适从，只好听任浪潮卷伏。本来，荣经民盟从镇反、反右以来就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就已经有了谈盟色变的政治氛围。随着“造反”理论向实践的普及，打砸、抢、抄、抓席卷全国，尤其是惨无人道的“清理阶级队伍”，“红色恐怖”笼罩全国。荣经盟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不久，又被划为“反动组织”，所有盟员都被冲击，盟员都“名正言顺”地成了“牛鬼蛇神”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经多次残酷无情地“批斗”、“通过触及皮肉来触及灵魂”的蹂躏，盟员之间只能道路以目，甚至牵连盟外有联系的朋友遭殃，哪还敢开展什么活动！个个身心备受摧残，战战兢兢、气息奄奄地生活在绝望之中。

伟大统帅的红卫兵小将连中南海也敢冲，刘少奇也敢抓，宪法也敢践踏，所有的公、检、法都敢砸烂，小小的荣经民盟又算得了什么呢！1968年，荣经民盟支部被当时的“革命造反组织”造了反，全部档案被毁，书籍、财物被洗劫一空。1971年“革命委员会”干脆将支部从民主正街59号（老地名叫歇马庙）会址赶走。如果说1957年反右之后民盟就已名存实亡的话，至此，荣经民盟算是名实俱亡了。

1957年后余下的七名盟员，有的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后开除公职，赶下农村，交给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如谭昌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剥夺公民权，开除出教师队伍，于1970年7月押下农村监督劳动改造。说到这些人的家属子女受的株连、不公正待遇，就更是苦海无边了。1975年初，长期遭受四人帮迫害，刚刚恢复自由的李一氓和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前往北京辟

才胡同政务院分给张志和的房子看望张志和，这是张志和晚年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情。李一氓问他：“你还保存着毛主席在延安送你的照片吗？”张志和说：“当然，几次抄家，也没让他们抄去。”李一氓说：“要保存好，那才是你真正的历史。现在是权奸乱世，但你要相信，总有一天党和人民会把你的历史弄清楚的。”此照片毛泽东头戴红星帽，为斯诺所拍。现为张韬英保存。数月后，张志和在北京死于车祸，终年 81 岁。

大家都都期盼着拨云见日的一天，但对于张志和来说，这一天来得太慢了，他终究没有等到澄清历史，还他清白的那一天。